
吳水雲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黃彥傑*

記錄：黃彥傑

時間：2017年2月27日、3月25日、4月23日、
5月20日、5月28日、9月20日、
2018年1月19日

地點：花蓮市美崙吳宅

吳水雲，出生於昭和五年（1930），台灣花蓮人，家族原居於苗栗銅鑼村，父親於1929年移居花蓮，是典型的東台灣移民案例。吳水雲成長經歷之特殊處，乃為其係現今在世的花蓮縣縣長中年紀最長者，同時因其經歷日本統治下的生活，對戰前的花蓮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其所受教育中，有長達九年為日本教育，因此由此可知，我們可以透過吳水雲的訪談看見戰前花蓮的樣態，社會、地方、軍事、戰爭等等面向皆有相當篇幅。

* 黃彥傑，1998年生，目前就讀於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三年級

一、前言

本文以前花蓮縣縣長吳水雲先生（1930~）日治時期生活至戰後考上師院前之經歷（1930-1949）作為本次訪談目的，並希望透過訪談補足花蓮地方文史資料，以及讓人一窺戰前花蓮社會樣態與戰後民心徬徨，並敘及吳水雲先生於二二八事件中的經歷與戰後求學經歷作為探究，但重點仍聚焦於 1930 至 1945 年。

戰後台灣出現重大轉變，無非是原本的日本殖民者因戰敗而離開台灣，轉而由中華民國政府進行統治，目前有許多相關論著與口述訪談討論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但大多數仍集中於西部地區，對於東部的探討甚少。此訪談即可補足此塊的不足、呈現出戰後初期花蓮地方樣態，以及面對國民黨政府來臨時人們的心境。當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一年四個月後，發生了 228 事件，花蓮雖較西部並無劇烈傷亡，治安也較為平穩，但仍發生民衆反抗，從口述訪談中我們亦能從口述訪談中看見花蓮二二八「看似平靜下實則風起雲湧」的生態。

關於吳水雲先生的訪談，早在 2004 年台灣省諮議會即有出版，¹ 但省議會的版本對於許多細節部分仍未描述。如吳水雲先生戰爭時期相關的回憶，不管是改姓名、學徒兵、戰爭時期花蓮盟軍戰俘等描述，在原有的訪談錄中皆未有太多的著墨，或與筆者訪談及後來的考證有所落差，而筆者透過多次訪談吳水雲先生，將相關的資料作了更細緻的整理，並以新的資料進行考證，使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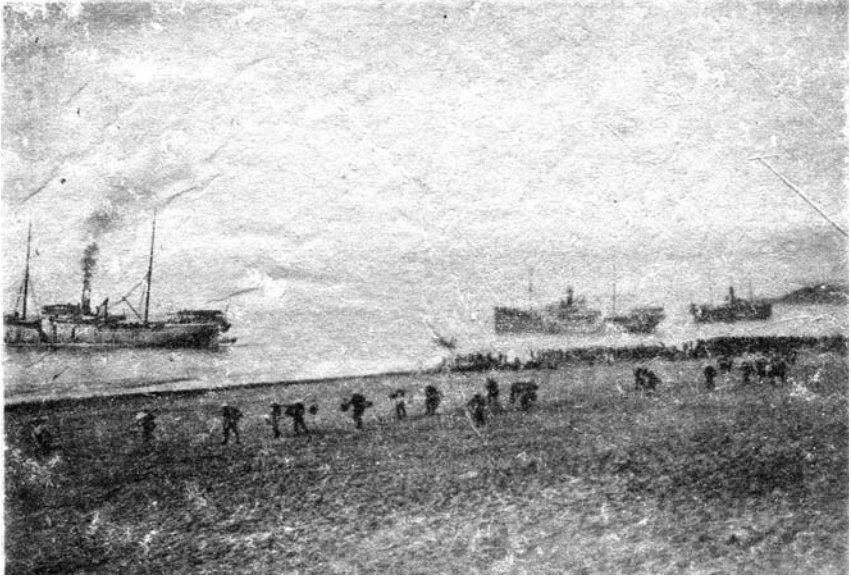
1 參見：台灣省諮議會，《台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吳水雲先生訪談錄》（台中：台灣省諮議會，2004），頁 9-39。

有研究的錯誤與不足得以補齊。

二、出生及家世

我們吳家祖籍在大陸廣東梅縣，大概在吳太伯下來九十四世來苗栗，從廣東來算是第十六世，我們有兩個算法，一個是從太伯公，他是吳氏的始祖，廣東的第十六世來到了台灣。我的父親是二十世，二十世時來到了花蓮。到花蓮的原因是我的祖父有兩位祖母，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事情，父親的母親是大祖母，當祖父有了二祖母後，可能有些冷落了大祖母，因此我父親帶了大祖母離開了苗栗來到了花蓮，時間是昭和四年（1929），我是第二年在花蓮出生，所以我上面的哥哥姐姐都不是在花蓮出生。上面有三個哥哥、四個姊姊，父親攜家帶眷來花蓮，當時沒有蘇花公路，所以是坐船來到了花蓮，當時是先坐船到南濱海上，到了南濱後坐「木板船」，真是費盡了千辛萬苦。當時海岸很長很長，現在台灣西部慢慢浮起來、東部慢慢下沉的趨勢，例如以前台南安平港，現在根本不是港，新生地產生浮起來了，東部的海邊慢慢消滅。

來到花蓮的原因即是爲了務農，我們先找了一塊地，並找到一位代書來幫我們處理土地事宜，當時可以靠水利設施灌溉的地即是好地，代書帶父親去看地，父親認爲地點很好、灌溉系統也很好，就決定選擇此地，並將錢交給他、拜託他，代書說好這一季收割後土地即歸父親所有，父親回去後舉家帶眷來到吉安稻香村落生根並尋找了房子做爲據點，今天我們吳家的親戚很多都



花蓮港尚未建成前，搭乘汽船前必須在南澳換木板船（圖片取自：未知，筆者自藏）

在吉安稻香村那邊居住、定居。當父親搬來這邊並要耕種時，有一個人來問父親說：「誰請你們來耕種的呢？」父親便回答：「我買的土地啊！」原本的地主覺得奇怪，因為他並沒有賣地，為何我的父、母親會在此地耕種呢？後來一看才知道原來地契上的土地並非那裡而是被代書騙了，於是父親重新開墾，從這件事情後，父親便認為小孩子必須受教育。我父親是會背四書，會背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經，可是他沒有念書，所以不曉得字當中之意義，雖然經書都背的滾瓜爛熟，可是卻因為沒有念過書，所以不識字義。後來父親便下定決心即使小孩子沒有褲子穿，也要讓小孩子念書、即使讓小孩子吃稀飯也要讓小孩子念書，下了這個

決心後，我們兄弟一共五個人，包含我的弟弟以及姊妹四個人，都念了當時的基本教育，至少國小以上，甚至是更高等的教育。大哥叫喜雲，大哥從國小畢業後還念了農業補習學校——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農業補習學校相當於現在的高農程度。²畢業後在日本時代就做了公務員，在豐濱鄉公所當會計人員，成爲了當時令人稱羨的「薪水階級」，在我六歲時，他十八歲，當時他去鄉公所當了公務員。³二哥叫德雲，我二哥也都受了相當的教育，他於田浦國民學校任教，後來當了田浦國民學校的教諭，最早當了學校的助教，⁴老三叫做雨雲，下雨的雨，他是農校畢業，那我叫水雲，父親取給我們名字如下：「喜、德、雨、水、富」，因爲農家是看天吃飯的，希望高興得到要有雨水，最後我的弟弟是富貴的富，我姊姊第一個叫己妹，第二個叫石妹、第三個是玉美、還有一個定妹，決定的定，但她比較早年過世了。

小時候家境雖然很貧苦，但我們傳統家庭卻很重視「家規」，對長輩要尊敬、兄弟要和睦、對年少要慈悲、工作要勤奮，大家有工作就分工合作，家裡經濟都是統一掌管的，雖然哥

- 2 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創立於1923年設立，現今花蓮高農。參見許佩賢著，〈日治時期的台灣實業補習學校〉，收於《師大歷史學報》（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2013），頁110。
- 3 吳喜雲，戰前曾於1936、1937年服務於花蓮港廳新社區，擔任區書記一職，台灣總督府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典藏，〈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十一年〉、〈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十二年〉，2017年4月20日調閱。
- 4 吳德雲，戰前曾於1940、1941年服務於花蓮港廳田浦公學校（田浦國民學校），分別擔任教員心得、助教等職位，台灣總督府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典藏，〈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十五年〉、〈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十六年〉，2017年4月20日調閱。

哥有了薪水，但也是拿出來讓大家都用，爸爸當年是掌握家裡的，但我大哥是會計的專才，於是我父親在七十歲時就將所有家裡的錢交給了大哥來管。老二薪水也是掌握在大哥手中，由於要張羅很多子女的花費，所以要非常節儉，任何錢都必須要十分地清楚。我畢業後在師範學校教了三年，後來在國小當校長，薪水也規定要先原封不動地交給我大哥，大哥收到薪水後，便撕開薪水袋拿出一、兩百塊給我當「零用錢」，當校長時亦是如此，我太太的薪水則是留下來給我們家用，兄弟的通通都歸大哥來管，這種生活當然有紀律、有家庭的溫馨，當然也有一些傳統家庭所謂的「是是非非」，這都難以避免的，有時也會多少有一些不滿、有些阻礙，但這也沒有影響我們的團結。我們過年過節卻也還是在一起，記得最有印象的是家中有個鼓，要吃飯時便會打鼓，大家就會回來吃飯，而這種樂趣是現在年輕人享受不到的，這都讓我非常懷念，當年物質很缺乏，但精神卻很豐富，當時我們去挖蟋蟀、抓蟬、牽牛吃草等等，回憶非常的多。

三、求學歷程

以前我是念田浦公學校，念到了五年級我才轉到花蓮市的昭和國民學校，我在小學的成績都很不錯，一直都是擔任級長的職位，當時的班長很權威，有時候遇到不守規矩的同學可以打他們，我很多同學可能也被我打過。公學校二年級時，有一件事情讓我非常難忘，4/29 是昭和天皇的生日，當時被叫做「天長節」，不管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學生都要到學校去升旗，升旗結束

後四年級以下的學生便放學回家，高年級生則展開天長節紀念大會。當時學校並沒有禮堂，我們的集會便是兩間教室打通來充當禮堂，五、六年級的學生參加天長節紀念活動，我原本應放假回家，但我想等五年級的學長一起回家，因為我家離學校要走路半小時左右，我想找個伴一起回去。

高年級生進去開會以後，我就在學校旁邊鞦韆，鞦韆一共有兩個，其中有個是壞的，我就在盪好的那個，有個我們班的學生，成績不是很好，他也想盪鞦韆，就對我說：「吳水雲你讓我坐一下嘛！」我心裡面想我才不會讓你坐呢！由於心中起的壞想法，讓我得到了壞的教訓，我當時對他說你等一下，但我卻一直盪、一直盪，等了很久我不下來他也放棄了，他便說我要回家了，並從我面前走過，我的鞦韆一下來便「碰」的一聲碰到他的頭，當下那位同學血流滿地，他大聲地哭，裡面的老師、學生都跑出來看，尤其我那班的導師叫林賢達老師，⁵他看到自己的學生發生意外非常的緊張，學校沒有什麼衛生設備，於是趕緊帶到醫院去醫治，他也叫我等一下、不能走，一個多小時以後那位學生的頭才包紮好。

老師當時問我：「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就老實地回答：「鞦韆碰到他的頭。」老師就用很懷疑的眼神看我，他對我說：「吳

5 林賢達，台灣新竹人，戰前曾於 1921-1944 年於新竹關西公學校、石光公學校、石光公學校坪林分教場、新埔公學校、花蓮港廳立玉里第一公學校、花蓮港廳立瑞穗公學校、花蓮港廳薄薄公學校等地任教，1938-1944 皆於花蓮港廳田浦公學校（田浦國民學校）擔任訓導一職，台灣總督府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典藏，〈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2017 年 4 月 20 日調閱。

水雲你是我們班的班長呢！我一向覺得你是好學生，你今天怎麼說謊了呢？」我便回答：「我沒有說謊啊！事情即是如此！」老師對我說不要怕、老實講老師會原諒你，當下我覺得很莫名其妙，因為事情就是如此啊！他便把受傷的同學叫來，受傷的同學說：「吳水雲用石頭丟我！」老師認為我說謊，為何用石頭丟同學卻又說謊說鞦韆弄傷？老師便要我承認事實，我當時不斷地反駁，老師認為我強辯、說謊，於是開始體罰我，要我說出實話，告訴我只要說出實話就會被原諒，但我不斷堅持所說的事實並無騙人，老師盛怒下、也焦急的想得到答案、追究出一個事實，老師一直打我，我不斷被逼退到教室後方，但我仍堅持我講實話。中午時間到了，老師要回去吃飯，吃飯前他畫了一個圈命令我不能離開圈圈內，我被打都沒有哭，老師一離開我的淚水滾滾流下，感覺很委屈、受辱，為何說實話仍要遭受懲罰？老師為何不相信我？為這事情感覺非常委屈。當下我尿急，但也不敢跨出一步，後來想起來覺得其實跨過圈後也不會怎麼樣，但就是不敢跨，因為我是守規矩的學生，等到他吃完飯後回來，他看見眼淚碰過白線，白線很模糊，他認為我跨出去了，於是又將我毒打一頓，這位老師光復以後當了這間學校校長，在日本時代，本省的合格老師很少、也很難當上校長。現在回想起來或許一切都有上帝的安排，可能是上帝在我心裡埋下了關注教育的種子，對教育應該要有適當的態度，這個對我影響非常深刻，我認為受到委屈、受到屈辱。以後當了老師，對學生的行為我就會有不同的角度來看，以後若有發生事情，我對事情的處理都會更加地慎重、小心。

第二件事情是五年級時，這也是我人生重大的轉折點。五年

級時，我們學生就有點好奇心在，尤其是在「性」與男女之間方面的事情特別地好奇，當時我的老師是日本老師，叫做「土手原老師」是單身老師，⁶他在中午午休時間一定跑去一個女老師的教室裡面，並將門關起來不知做什麼，出於好奇心下，我們就在教室周圍走來走去，想要一窺究竟，但卻沒人敢開教室的門來開。當時我們彼此傳著：「誰敢開就是英雄！」這樣的一句話，有個笨笨的學生自告奮勇表示願意開，真的就開門了，但我們其實連看都沒有看便跑走了，跑到廁所後面又在集合在一起，「怎麼樣啊？怎麼樣啊？」大家急忙地問著，他很得意的說：「女老師躺在講堂上、我們老師趴在上面，在做那種事情！」我就重複了一下，我問：「真的是這樣子嗎？」另外一個也被我打過的學生在旁邊說：「吳水雲你說我們老師跟某某女老師做了什麼事情！」我回答說我沒有說啊！我只有問而已，他便一口咬定我講了。下午第一節是歷史課，那時規定課本要放在桌子上面，老師進來後，我是班長，我叫大家起立、敬禮、坐下，他站在我後面，站起要告狀，我回頭瞪他說：「你敢講？」他看看我又看了看老師，想講但卻害怕不敢說，老師說：「某某同學你有什麼事情講了沒關係。」他說：「吳水雲說你跟某某老師做事情！」眼看那位老師臉一陣青、一陣紅，他說：「大家這堂課自修，吳水雲把書

6 土手原壽，日本三重人，戰前曾於1936-1944於花蓮港廳玉里第一公學校、花蓮港廳田浦公學校、花蓮港廳花蓮港市西國民學校任職，皆擔任助教一職，吳水雲先生回憶事發為公學校五年級時，根據台灣總督府職員錄所記載，當時土手原壽先生擔任初等科五學級老師，因此可推斷事發為五年級時，台灣總督府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典藏，〈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2017年4月20日調閱。

收起來，跟我來！」要我到他辦公室，下午第一節剛好老師上課的上課、有些沒來，整個辦公室空無一人，他便問我有沒有講這話？我便回答沒有說，但他當下惱羞成怒、憤怒至極，用非常粗的藤條說：「清國奴的精神沒有改過來！」這是很難聽的話，明顯是帶有種族的優越感才說出來，說完便開始打我，我一生就是那麼一次，真的感覺眼睛冒出火星、火花四射，痛不欲生，甚至打到藤條碎裂，我也被打到麻木。直到中條校長，他進來後馬上對老師說：「你是發瘋了是不是？」我記得聽完這句話後我就暈倒了，校長把我抱到自己的宿舍，我睡了一陣子我才醒過來。

當時已經是世界大戰末期，光復前日本跟中國也一直在打仗，日本在學校也有思想控制，小學畢業要考中學除了有筆試外，還有內審的制度，內審書是老師對每個學生的評鑑，例如某某學生如何，內審書若寫不好、寫他有中國思想、異端思想，就算你考得再好也不會被錄取。校長知道當時有這個情形，於是把我哥哥找過來，我哥哥、姐姐在校成績也都很好，我哥哥當時在社會上做事，校長對我哥哥說：「老師一次帶兩年，六年級也會是同樣的老師教，畢業的內審書也一定是那老師所評的，你弟弟在這間學校已經待不下去了，就算成績再好也無法繼續升學。」言下之意即是要我轉學，當時有了學區制度，由於我姊姊人在花蓮市，所以我戶籍轉到了花蓮市區，並轉學到昭和國民學校（今日明義國小）。

轉入昭和國民學校對我而言是很大的轉折，因為田浦公學校是所謂的「番仔學校」，原住民比較多，平均成績也較低；昭和國民學校則是市區的學校，他的學區是繁華的商業區、生活程度也高、知識程度也較高，因此我轉到了這間學校，當時我從吉



薄薄公學校（圖片取自：《東台灣展望》，葉柏強先生提供）

安走到學校要花了一、兩個小時，真的好遠，平常則住在我姊姊家中。這間學校分了紅、白、黃三個班，我是紅班，這是好班、要升學的班。我遇到了一位日本老師，他來自宮城縣的老師，叫「阿部」老師，⁷他非常地有愛心，以前曾為棒球教練，在他的領導下昭和國民學校學生也比較有競爭力。當時的老師會看成績建議你選擇報考花中、花工、花農，成績好的建議考花中，次之則報考花工，我原來基礎教育不是很好，於是老師建議我報考花工，所以我是念花工電氣科，在光復前我是念花工電氣科。⁸在

7 阿部小太郎，日本宮城縣人，戰前曾於1936-1942年於花蓮港廳昭和學校任職，擔任訓導一職，台灣總督府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典藏，〈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2017年4月20日調閱。

8 花工即為花蓮港花蓮工業學校，建立於昭和十五年（1940），並設立機械、電氣、有機化學三科，招收公學校畢業或修業6年者，屬於乙種工業學校，昭和十八年（1943）升格為甲種工業學校。參見鄭麗玲著，《台灣第一所工業學校——從台北工業學校到台北工專（1912-1968）》（台北：稻香，2012），頁222。

昭和國民學校的那段時間我受到的知識教育可說是愛的教育，老師非常地照顧學生、無種族偏見，甚至光復後我當縣長還去日本看那位恩師，他也認為我是他的驕傲、心感安慰。

四、花蓮港花蓮工業學校

我當時選擇工業學校有兩個因素，第一是因為小學就讀薄薄公學校轉學到昭和國民學校，在這一年多的時間中，當然成績並非頂尖，沒有趕上一般的市區公學校學生的程度。當時阿部老師他評估我們學生大概可以考上哪間學校，他評估我大概花蓮中學校有些困難，所以他建議我考工業學校。

我也願意考工業學校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在十歲時，我大哥在豐濱當日治時期役場的會計役，家中務農，想買一條小牛，買小牛要從花蓮坐火車到光復，光復再走路到豐濱，當時到豐濱沒有火車或台車，交通工具都沒有，因此只能選擇走路。走路真的是翻山越嶺，過水時還要請原住民用竹做的轎子來把我們抬起來，我們小孩子坐在轎子上過去，牛是他們野放的在抓一隻快成年的公牛，我們就買來，牛當時很怕生，遇到汽車從旁邊路過就會發狂，所以我們會把牛的眼睛矇住，讓牛不知道，這樣才能帶回來，於是這條牛與我十分要好，陪伴著我的童年，我們一直把他從幼牛、小牛、成牛、老牛一路帶到大，牛幫我們家農作很多年，最後衰老而終。往豐濱走到今日奇美一帶，我們一路走到最高嶺，在最高嶺休息時大哥跟二哥說：「秀姑巒溪這條河水量很大，假使擋起來做水壩，可以發電的話，必然可以供應東台灣的

發電，但可惜沒有人做。」當時這個想法在我幼小的心靈產生激盪，我想沒有人做過的事情就由我來做吧！因為這樣的念頭，往往幻想變成夢想、夢想變成理想。有這樣的念頭於是我選擇工業學校，工業學校有電氣、機械、應用化學三科，於是我選擇了電器科。

進入花蓮工業學校後要念三年的書，而非五年，因為我念的是乙種工業學校，但在花蓮工業學校真正念書的時間其實只有一年。花蓮工業學校對體能訓練是十分重視，每星期都有一次的長跑，長跑分三個路線，第一個路線是操場十圈，第二個路線是美崙山環山，第三個路線是跑到三棧（太魯閣入口）第三個路線是一個月一次進行。二年級時，我因為比較瘦弱但肺活量大，所以跑步跑了全校第二名，當時教務長井上先生罵那些三年級生：「你們算什麼？二年級的人跑了第二名，你們還跑不過下級生。」這讓我在當時風光一時。

五、戰時的花蓮與初見俘虜パーシバル將軍

皇民化時期，我們也曾改姓名，一般來說，來自客家的人多半改成「梅村」，這是因為他們多數原籍是來自於廣東的梅縣，而我因為大哥為了紀念他以前在農校恩師的關係，因而改成了「正城」（マサキ），我的名字則改為「正城敏雄」。除了改名外，戰爭時期社會經濟亦有所變化。戰爭時期的物質生活相較於平時而言是比較匱乏的，日本人也因物質匱乏的關係，所以他們用配給制，米等等都用，而且日本人還有國語家庭，是比較優待的，

一般民衆非常的苦，所以常常有黑市的米、黑市交易等等，但被經濟警察抓到要重罰。

戰爭時期我們也不敢偷殺豬，但是雞則可以，雞是沒有限制，豬是要有官方認定，要先蓋章來記錄，雞是自己養的、自己可以殺。當時也有米不夠的問題，米不夠我們就用番薯，番薯籤就是當時來的，有時一塊一塊，有時用刨刀削成一條一條，混在米裡面煮。有時番薯籤會曬乾，以利長期保存，米也會曬乾。日本人都有儲米的習慣，都是存在美崙山下的隧道，還有銅門的山洞。光復以後，我們在工業學校，日本兵回去了、中國兵尚未到來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就曾偷偷的去防空洞裏面拿取物資。

花蓮也曾關過盟軍的戰俘，現在將軍府對面的憲兵隊以前是司令部，戰爭時期戰俘有些收容在那邊，比較高級的好像是收容在今天的松園別館。當戰俘來到花蓮時，我看過他們的遊街，他們應該是從車站的地方走過來，日本軍讓他們徒步，沒有讓他們坐車，旁邊是日本兵荷槍在旁，這些戰俘人數應該是十幾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パーシバル將軍，他是英國的將軍，個子很高，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國人，他身旁的人大概都是垂頭喪氣，因為是戰俘嘛，不可能有傲氣，都是垂頭喪氣，非常謙卑的走在街上，一般民衆可能有口頭的辱罵，可是我不記得有人丟石頭，民衆觀看時都還滿理智。⁹ 那次他們遊街不是學校老師動員帶我們

9 參見溫萊特回憶錄：「我們拿起行李，排成了一直線，走過市區，這是一個會讓人沮喪的經歷。街道上站滿了成千上萬的沉默的日本人和中國人，盯著我們，彷彿我們是怪異的存在。」Jobathan M. Wainwright 著，《General Waninwright's Story》(DOUBLEDAY&COMPANY,N.Y.,1946)，pp.175。

去，而是我剛好碰到的，不是學校帶的團體行動，而是個人經過剛好看到。當時我心裡認為他們是來自欺負日本的敵國，我們台灣那時候是屬於日本政府的土地，所以小時候就是把他們當作是敵人，一方面感覺到非常的痛快，我們把敵人俘虜到這邊，一個將軍變成了俘虜，小孩子會有這樣的心情感覺，這些戰俘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國人，是個稀奇的經驗。

六、空襲下的花蓮

戰時我們每一家都要做一個防空洞，我家當然也要做一個防空洞，上面鋪了稻草，一方面偽裝，一方面當防空洞，當時空襲我們最怕 P38，P38 是雙引擎的戰鬥機，飛的很低又很快，聽到聲音時早已到了我們的頭上，比較老的是雙翼飛行機，聽到雙翼飛行機的聲音我們就躲，在溪口那次就是 P38，非常快的掃射。我們每一次都要躲著，有次空襲我父親在上大號，空襲時他還在上大號，我們很擔心地叫他趕快躲藏，但他在上廁所也無法馬上出來，機槍打了一陣子後，家中牆壁滿是彈痕，我家中供奉的天照大神也無一倖免，空襲時也被打到，當時我心中想著日本神連美國人的子彈都躲不了，你看多危險。我們看到當時爸爸在廁所裡面，所以緊張的跑出來，看到飛機低空的飛，飛機上有一位美國的飛行員，他連飛行的眼鏡都拿掉，讓我印象很深，他的鼻子很大，我都看得一清二楚，飛的那麼低，可見當時飛機也不是那麼快。

我記得開始的時候飛機都從很高的地方飛，然後投下小的炸

彈，主要是我旁邊有個防空壕，日本已經沒有飛機了，日本軍就用竹子編成飛機放在防空壕來騙美國人，剛開始時美軍會一直往飛機啪啪啪的掃射，掃射半天美軍發現不起火啊，後來他們發現是竹子的假飛機，以後他就不打了，以免浪費子彈。當時沒有發給我們槍，只有給日本駐南機場的士兵才有槍，日本兵看到美國的飛機會用三八式步槍碰！碰！碰！的打，怎麼可能打到呢？哪一個地方這樣打？美軍飛機看到就回來掃射，後來人就死了。

二哥有一次坐火車要到溪口途中，溪口當時有火車經過，因為坡度落差太大現在早已不再使用，溪口以前是火車開動以後先上去，後退一些再走，分兩段進行爬坡，因為一次爬坡是無法進行的。爬一段後退再爬，在那個地方遇到美軍的空襲，因為還有貨車，因此美軍判斷當中有軍需物資且具有轟炸價值，因此美軍開始掃射，死了非常多的人。我的好友，現在美崙教練場的主持人邱煥堯是我的同學，¹⁰ 他的太太與媽媽都有遭受空襲掃射而受傷，太太被打到腿，至今還拿著拐杖；他的媽媽當時也在場，則是被打到手，聽說當場血流如注，可是後來空襲結束後火車仍繼續行駛到鳳林，鳳林才有大的醫院，聽說打到時痛的感覺都沒有，直到到了鳳林才發現滿身是血，腳不能動。¹¹ 我二哥躲在火

10 邱煥堯，台灣花蓮人，1946年畢業於台灣省立花蓮工業職業學校，後任職於花蓮美崙汽車教練場，參見：<http://www.hlis.hlc.edu.tw/~p01/1021007/102hlinform.pdf>（2017.5.19 點閱）。

11 筆者透過訪談邱煥堯先生與其妻後得知，其妻回憶到：「昭和19年10月13日（1944年），我當時搭火車是要往富里躲空襲，但在溪口路段遇到空襲，臀部也被空襲子彈打中，我的母親則是有隻手臂斷掉了。火車後來到了鳳林，由張七郎的三個小孩將我們傷患包紮才穩定傷勢，當地的禮堂也全部都是因空襲而受傷的傷患。」，〈邱煥堯先生訪談紀錄〉，訪

車下僥倖逃過一命，可是看到血肉模糊的樣子他三天都吃不下飯。現在旁邊有一個小的土地公廟，便是紀念當時空襲死者與傷者，做了一個佛像在那，走舊路還能看到。¹²

南機場是日本的特攻隊出發基地，我三哥差我兩歲，他去了南機場當整備兵，所以他很清楚裡面的情況。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飛機也是剩下的，據說他們若隔天拂曉要出擊，大概四、五點鐘就起飛，前一個晚上就在整晚準備，要將飛機狀況弄到最好，他們飛行前只有裝上單程油料，砲彈也鎖死，所以不是太勇敢、忠心愛國，而是不得不下決定，回來也沒有油料，這是一定要死的，所以多半選擇轟轟烈烈的戰死，這真的是很悲哀的事情。當然表面上寫遺書、留下指甲、頭髮，盛大的給他們歡送會，歡送會完要熄燈以前，那些少年兵們都望著東方的天空，在思念著遠方，我哥哥就問他們：「這時你們最想念的是誰？」他們回答不是日本天皇、也不是父親；而是母親啊！所以母親的偉大讓我以後當了縣長，在母親節我就將這個故事說出來，大家都含淚，我說母親的偉大就是這樣，小孩子最後的關頭想到的都還是母親。

談時間：2018年3月28日，於花蓮縣花蓮市邱宅，未刊稿。

12 關於此次空襲，筆者透過訪談邱煥堯先生與其妻後得知確切時間，此時發生台灣沖航空戰，1944年10月12日至16日美國海軍對全台灣進行空襲，而13日火車當天可能是美軍漢考克號第7艦載機大隊出動的SB2C空襲花蓮鐵路設施與化學工廠，因而其遭到空襲攻擊。參見張維斌著，《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台北：前衛，2015），頁55。

七、烽火連天的學徒兵生活

花蓮工業學校的三年當中，只有第一年真正念到一點書，就是普通電器科讀的書，像是保險絲如何配置、基本電學、如何接電、電流、電壓、基礎電等等，第二年幾乎一整年都是在勞動服務下度過，做堤防、戰壕、跑道、防空壕（南機場），¹³直到今日我稻香村的家都有防空壕，中間要做格納庫，二年級時都要做這些工作，敵人飛機來轟炸時的躲避處、在山洞設立防空壕給飛機躲藏、掩體等都是我們做的，幾乎二年級都沒念到書。

三年級時我們當了正式的「學徒兵」，我是被分配到了第六中隊，同中隊內有電氣科老師日下繁、吉野車站站長吉村政雄之子吉村正敏、鬼木善盛、鬼塚等同學，¹⁴學徒兵穿的軍服與一般相同，同時也掛著階級，從二等兵開始掛，最後我升到了上等兵。¹⁵除了花蓮工業學校外，我們也與花中、花農一同編入學

13 花蓮港（南）飛行場：1941年由日本陸軍所建，飛行場位於花蓮港廳花蓮郡吉野庄南埔，老一輩花蓮人稱「南埔機場」，今日花蓮縣吉安鄉南海一街至十街位置。其中為陸軍特別攻擊隊之飛行場，如第八飛行師團誠第16飛行隊、誠第26飛行戰隊、誠第16飛行戰隊、第23獨立飛行中隊等，皆有由此出發進行特攻之紀錄。根據終戰後美軍由日軍呈報紀錄所記載花蓮港（南）飛行場掩體有「特掩」15座、「特大」30座、「小」10座。參見洪致文著，《不沈空母：台灣島內飛行場百年發展史》（台北：洪致文，2015），頁333-341。

14 參見《留守名簿 特設警備第538大隊·灣第13875部隊（學徒）》，未刊稿，感謝小野純子小姐提供並整理。

15 吳水雲在此提及曾被編入學徒兵，並與花蓮中學校一起接受訓練。應為特設警備538大隊（13875部隊），參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2499300、南方・支那・台灣・朝鮮（南朝鮮）方面 陸上部隊略歴（航空・船舶部隊を除く）第4回追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徒兵，我們部隊在鯉魚潭旁的軍營，軍營一方面藏有日本軍需物資，另一方面也派駐了人員，我們學生兵即在此駐紮。在池南有日治時期的陸軍醫院，¹⁶ 旁邊有兵舍，於是我們被派駐於那裡，由正式的軍人來領導，我是派駐於第六中隊，由中隊長來領導，除了軍事操練外，另有搏鬥、實彈射擊、站衛兵，平常較為學術的活動是花中較我們強，但體力比賽上，則我們與花農優於花中。軍方也發了三八式步槍，讓我們站哨，當下完全是軍隊生活，我們的中隊長是中尉、小隊長位階是曹長，是非常嚴格的訓練。訓練課程是軍事工事較多，例如到海岸線進行工事，訓練刺槍術課程時因為槍不夠，所以也用竹子削尖來代替槍，現在想起真是覺得日本軍事教育很愚蠢，人家都發明原子彈了，卻還想著用竹子來對抗，可是我們苦在心裡卻也無從表現出來，總之都是本省人，也有日本同學，但他們較具優越感，難免常常有對立的衝突。

學徒兵時期的糧食非常的缺乏，尤其是少年成長時食量更是龐大，糧食十分不夠，我們幾乎都是吃米跟地瓜混起來吃，湯的話被我們稱做「太平洋湯」，太平洋湯是原住民吃的草，當中滴上幾滴油，沒有肉來表示肉，我們稱呼為「太平洋汁る」，這樣過日子，蛋白質缺少我們則知變通，我們抓蝸牛，蝸牛殼打破，用八幡鐵線串起來，用火烤來吃，烤一烤把蝸牛的汁液滴光沾一

16 此為花蓮港陸軍病院池南病院，開設時間為昭和 19 年 9 月 30 日（1944 年），部隊長為軍醫中佐橫山孝一，部隊番號為台灣第二一二九部隊。參見：JACAR(アジヤ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397600、戰史資料調査票(其の 1) 花蓮港陸軍病院台灣方面關係部隊戰史資料 昭和 19 年～20 年 8 月。

點鹽就來吃，現在有很多蝸牛料理、蝸牛店，在怎麼好吃我都不敢吃，真的是吃膩了。

最高興的公差是採買，採買是大約早上三四點鐘推著リヤカー（鐵板車），從軍營出發，跑到了花蓮市來買菜，由班長帶著買菜，主要以青菜為主，以及絲瓜、肉，這是最快樂的公差，回去的路上我們先吃絲瓜，肉實在是令人羨慕、嚮往，所以我在快要到兵舍前把一塊肉丟在兵舍附近的草叢，晚上爬出來拿肉，肉上面雖然都是螞蟻，但還是洗一洗拿來烤，當衛兵時，冬天很冷，把肉煮來吃，那是最大的美味。有一次在煮的時候中隊長回來了，我們十分緊張地集合要準備迎接他，如果被他發現的話那是很不得了的事。他經過時說了何やってるか？（你在那邊煮什麼？）我們說さすいから（我們在烤火），他只說了それが就進去了，這真的是救了一命。還有爲了吃的東西真讓人傷透腦筋，很多讓人痛苦的懷念，現在銅蘭村都是泰雅族原住民，他們有很多的地瓜，我們買了地瓜來吃，不曉得是否因爲地瓜不衛生，所以軍中引發了赤痢（せきり），軍中的隊長與班長都認爲是吃了不淨的地瓜所引起的。而當時醫療也有限，有一次我們又偷偷地買了地瓜來吃，回來時可能有人密告說有人又偷買地瓜來吃，隊長於是集合大家問誰買了地瓜？沒有人敢講，不敢講隊長沒有辦法，於是叫大家排兩排面對面，大家面對面互相打臉，剛開始大家因爲都是同學，於是看似用力的打，實則輕輕地放下，隊長也看出來了，於是就說：「哪有這樣的打！」於是把一個人抓出來打，我們沒有辦法下於是開始打重一點，對方也認爲你打重了，於是又打更重，最後大家將對方視爲隊長一般，十分嚴厲地互毆。

最讓人畏懼的公差是站衛兵，當衛兵晚上要兩小時站一次，由於附近有墓地，加上死了以後就在附近燒，附近的味道十分讓人受不了，所以大家都很怕當衛兵，深懼有幽靈出來。汽油桶晚上會冷、會縮，冷縮的情況下會有聲音出來，聲音出來時大家怕的要死，以為是鬼魅來了，現在想起來真是可笑。我也是得到傳染病，一天不知道跑了幾十次廁所，於是有放了病假，可是要一直要跑，當時軍中除了赤痢外，也有瘧疾的傳染，但赤痢仍是較多。當時的我還沒有宗教信仰，生病時看到蜘蛛在旁邊，我都在求蜘蛛，幼小的心靈便會求蜘蛛，祈求蜘蛛保護我能痊癒，若能痊癒則一輩子不再傷害牠。後來果真好了，所以我現在看到蜘蛛就絕對不傷害，雖然當時是幼稚的心靈，但我仍對蜘蛛發誓過。

我在軍中最難忘的事情是有次媽媽知道我得到赤痢，他拿了些吃的東西來慰問，我也不好自己吃，但公開又一定要分享給大家，所以我就偷偷的藏起來在大便時吃，媽媽會面一下就走了，媽媽穿著傳統的長褲與台灣衫，一直走到縱然過了橋大約鯉魚潭，我在很遙遠的地方仍看到她回頭眺望，這時真的感覺母親的愛與溫情讓人無限感動與溫馨，現在回想起來這樣的影子仍常存於腦海中。她回頭根本看不見我，隔了一條河還頻頻回頭，望子的母親與我在軍中想母親的心頻頻照映，實在是讓人一輩子難忘。

當學徒兵的生活過了將近八個月的時間，在八月十五號時玉音放送，聽到日本打敗了，大家心裡都非常的興奮，日本人當然很沮喪，甚至有些人在哭，他們要回去日本，有些以前在學校欺負人的上級生也遭到被打的下級生報復，我們花蓮工業學校是還好，因為彼此都有感情，因此我們好好地送走日本人，毆打日本

人的情況並未發生，這是花工的狀況。光復時是十月，日本的畢業典禮是春天，所以還有一個學期，到了第二年的四月才畢業典禮。當時剛光復，日本老師有些回去、有些則仍留於台灣，美崙山挖了很多軍需的山洞，許多軍需物資藏於此，我們工業學校離美崙山的防空壕很近，在接收部隊還沒來、來了也管不到的情況下，我們潛入山中防空壕來拿物資。我們當時希望得到襪子、衣服來當「戰利品」，結果卻拿到一箱又一箱的罐頭。

昭和二〇		年	月	日	略	歴
九	三				現地復員完結	
九	二				終戰	
八	一五				停戰	
五	二〇				池南兵舎駐屯、洞門地区の警備	
五	一〇				台湾全土空襲時防衛に出動	
					米崙山障地構築に参加	
					同日、台湾軍戦闘序列に加えられる	
					臨時召集下令	
					警備召集下令(学徒で編成)	
					特設警備第五三八大隊臨時編成(花蓮港市)	
					特設警備第五三八大隊	
					(湾第一三八七五部隊)	

吳水雲先生所屬部隊學徒兵資料與，資料來源：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¹⁷

17 參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2499300、南方・支那・台湾・朝鮮(南鮮)方面 陸上部隊略歴(航空・船舶部隊を除く) 第4回追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八、戰後（1945-1949）

光復以後，日本兵走了，中國兵還沒有來，花蓮等於是空城，飛機場很多建材、飛機上很多機器，村子中彷彿如無政府狀態，大家牽著牛車進到飛行場，搬了很多東西，像飛行場的建材、飛機上的機器。但我哥哥因為受了日本教育，所以他絕對不准這樣的事情發生，連一根木頭都不能碰。我也進去飛行場爬上飛機，看到飛行錶掛在那邊，這讓我很佩服日本人，不是他們的東西就絕對不拿走，當時我心裡想著：「心裡好想要啊！好想要拿回來用！」但我的教育就是讓我不敢動，後來有些人對說我傻瓜，但起碼我不後悔。

經過戰後一段時間，我們被通知說國軍要來，當時我們內心都很興奮，他們從蘇花公路到新城，我從吉安走路走到新城、北埔去歡迎，大家都想祖國的軍隊要來，不分男女老幼都在沿路上歡迎。當時看到有兩種心情，第一是對祖國的失望，日本時代的漫畫都將中國軍畫成戴斗笠、穿草鞋、抬著扁擔、鍋碗瓢盆等等這種負面的形象。日本軍則是一流的，無論穿著、武器、紀律都是一流的，我們一看還發現真的是這個樣子，我們真的有點失望，大家第一個都是想：「祖國怎麼是這個樣子？」可是第二個心情則想：「經過八年的打仗，難免穿著不好。」大家對國軍都會有產生同情心，而且最興奮的是祖國的軍隊來了，那種感受彷彿如家人來到一樣，所以大家都歡欣鼓舞迎接。

今天許多人意識形態區分本省、外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政府軍素質不佳，蔣中正想台灣接收時，日本兵絕對不會乖乖的交接、一定會遭到抵抗，他不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日本輸就是輸

，一定乖乖的。所以蔣介石把有訓練的精兵都留下來，他沒有派第一流的軍隊來，他派第二、第三流的來接收，想如果有打仗這批老弱殘兵也是先犧牲掉，然後第二批再上來，這錯誤的判斷對今日台灣也深深影響。國軍當時沒有兵舍就住在學校或是公共場所，因為這些兵一方面知識低、生活習慣也不同，語言也不通，雖然南部的福建人我們還能溝通，但是大抵上還是不能溝通的。他們的生活紀律也不好，跟日本軍怎麼能比？馬上就被比下去了。老百姓的東西也都是隨便被亂拿，這些亂象台灣人都還能容忍，最讓大家不能忍受的是對女性的性侵與玷汙，這對觸犯到了台灣人的道德底線。

很多的笑話也隨之產生，像是以為買了水龍頭釘在牆上就有自來水，後來發現沒有水就找老闆算帳，這類笑話都出來了。慢慢地他們在台灣人心目中就像豬一樣，日本人是狗也是這樣來的。慢慢地本省的女孩子就不想嫁給外省人，男孩子也不娶外省人，否則會遭受異樣眼光。我大嫂六姊妹，親家最討厭外省人，結果六姊妹都嫁給外省人，有時感情是很奇妙的，大人不願意上帝還是給你安排好。

戰後台灣為中華民國所接收，中華民國政府的制度與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以學制上來說，日本學制是三月畢業，中國則是八月畢業，我們念的是乙種的工業學校，沒有高級的，後來才設立了高級的工業學校，所以我在 17 歲有一個學期的過渡階段。我二哥當時擔任宜昌國小的教務主任，他讓我過去擔任代課老師，因為日本的老師紛紛離開，而中國的老師尚未來台，師資不夠，於是他讓我過去代課，就這樣我代課了一個學期，這也讓我慢慢地與教育結下了緣分。當時下午我人在花蓮市，現在的花

崗國中（朝日国民学校）學々々々々，第二天去薄薄公學校教々々々々，後來擔任花蓮高中校長的李詩雲，當初即是我的學生，代課一個學期下來我哥哥認為我只有初等的工業學校畢業也不是辦法，於是叫我去報考花中的轉學生。

在日本時代的花中十個學生中，只有兩、三個本省人，其他都是日本人，工業學校則是四個日本人、六個本省人，農業學校則是兩、三個日本人，七、八個本省人，花蓮中等學校的比例大致是如此。我哥哥叫我去報考花中轉學生考試，考花中時我們算插班生，我跟大學同學的弟弟古朝郎一起去報考，他是農業學校畢業，而我是工業學校畢業，我們一起去考插班生。我記得當時考了以後，我們在花中的榕樹下躺著，也不曉得能不能考取。若能錄取，這裡操場的景色以後就能常常看的到，若沒有錄取，恐怕今天看的就是最後一眼。

後來錄取了，因為日本人都回去了，學生也不夠，因此成績差不多的就能錄取，但插班生錄取的沒有幾個，我一個、他一個，另外一個姓魏，也才這三、四個而已。因為學校也要有一定學生數，尤其日本人走後，學校要補缺額，經過考試後，我被錄取了，可是從職業學校轉到花蓮中學校的人也只有兩、三個人，說實在也不是很多，我記得我那班高一時只有 23 人，到畢業後亦是如此。

當時在學國語很困難，我也耗費了許多心力。另一方面，有一位老師的弟弟在花中念書，我跟他學一起學，後來我在師院的時候常常有幾個好友聚集在一起，相互來考破音字的念法，所以這樣下功夫的結果讓我的國語還算標準。在花中、師院時，平常主要還是用日文來進行溝通。同學如果是本省人，我們就都用日

語溝通，這也讓我的日語沒有忘記。在花中上課時我們都是說國語，但下課時都說日語比較多。此外，因為我是客家人，所以講閩南話會有一種「腔」，這個客家人的腔實在改不過來，所以還是使用日文較多。

花中戰後也有外省同學來就讀，但是人數較少，我們班只有一、兩個，有個老師的弟弟在我們班上，我的國語大家都認為還算標準，就是向裡面一位老師的孩子學的，他的國語說的很標準，我是向他學的，第一首中國歌曲也是向那位同學學的。老師們分別來自很多省分，地方口音、鄉音很重，我們都聽不太懂，不只是中文發音不準，英文的發音亦然，我也不習慣。在學校有些鄉音很重的人，他們讀書都馬馬虎虎，能夠低空飛過，我是擅長文史，英數並非我的強項，我太太的哥哥他是英數方面很強，他是在日本時代就讀花中的。所以考試時我們作弊，文史考試時我坐在前面，寫完了以後把考卷放旁邊，讓他從後面抄。花中時期我們都在學一般的國語、英文、自然、數學等等，我比較好動，而且我也喜歡運動，特別擅長排球，我也是學校中排球隊長、活動組組長，全校運動會就是我們班組成來辦的，我們那班傑出的人很多，像當時的班長後來當過台灣銀行的董事長、總經理，他的名字叫羅際棠。¹⁸ 花中當然很多回憶，平常我們對老師

18 羅際棠，台灣花蓮人，曾就讀於花蓮港廳玉里小學校、台灣省立花蓮高級中學，後就讀於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曾任華南銀行董事長、合作經庫理事長、台灣銀行董事長（1995-2000）等職位，參見：《花中六十年》（花蓮：台灣省立花蓮高級中學，1996）；山口政治，《知られざる東台灣：灣生が綴るもう一つの台湾史》（日本：展轉社，2007），頁399；<http://web1.hlhs.hlc.edu.tw/history1/ch3-5.htm>（2017.5.19 點閱）<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771&ctNode=62&mp=1>（2017.5.19



即為花蓮港小學校，今日明禮國小
圖片取自：《東台灣展望》，葉柏強先生提供

也很尊敬，但一方面日本時代接受的軍事教育，因此光復以後嚮往自由的教育，可是當時的訓導主任卻是一個非常鴨霸的人，教官中也有個四川人是個土包子，雖然起衝突，但大致上大家都很向上。

有次難忘的記憶是，民國三十五年的中秋節，我們進了高中，高中生晚上就在花崗山的尋常小學校散步，¹⁹ 我們同學有的姐姐在女中念書的也跟著去，包括現任更生日報新社長的媽媽，當年謝膺毅社長的太太，²⁰ 那時還沒結婚。她被一個小兵刁難，我們看了發現是同學的姊姊於是跑了過去看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因為語言不通，所以小兵向他們調戲，其中有個女生生氣下說了一句：「馬鹿野郎！」外省小兵聽的懂馬鹿野郎是罵人的話，當

點閱)

19 即為花蓮港小學校，今日花崗國中，創立於明治 43 年（1910）。

20 謝膺毅的太太為謝高仁里，是花蓮高等女學校第 15 期生，昭和 20 年 3 月卒業。參見：花蓮港高等女學校同窗會白百合會編，《會員名簿》（出版地不詳：2002），未見頁碼。

時真的是不得了，阿兵哥就不放過他們，我們幾個同學把阿兵哥圍起來與他理論，叫女生們走開，我們來對付，我們也曾有英雄救美人呢！

花中也發生一件事情讓我很難忘，念了花中時我們總想以前是念日本的軍事教育是十分嚴格的，尤其是學長制度更是讓我難忘，學長可以打學弟，如果他對你不爽的話就可以隨便找理由，例如帽子戴歪、斜眼看人等等就可以直接體罰我們。最討喜的學生就是有姊姊的，假如我有姊姊的話，他們爲了要追求就會討好我，但我就沒有，所以說也會被打嘛！光復後總是嚮往自由之下祖國的教育，可是在當時派來的教官卻是不好的。老師部分有好的，但卻也有說著讓人難以理解的方言的，讓人聽都聽不懂。我們的教官則是四川人，他是個老粗，跟訓導主任一起管教我們，由於訓導主任並非教育出身，因此對我們同樣及其嚴厲，十分嚴格的對待我們，不斷對我們說以前是受日本殖民教育、受奴化教育成長的。所以這時的教育，其實與日本殖民時期的嚴厲軍事教育差不了多少，學生一直有反抗的心。

在我高二的時候，十月二十五日是光復節，當時的光復節都要去提燈遊行，拿著燈籠在街上遊行，提燈遊行五點鐘即要進行準備，有個高三的學長遲到了，教官當著我們的面體罰他，訓斥著爲什麼遲到、提燈爲何不帶來等等。那時，我們不滿的心情已經到了爆發點。提燈遊行終點在花崗山，解散前要把燈火熄掉。這時候，大家紛紛拿起石頭砸向訓導主任，那時我也好像打到了他。因爲訓導主任老是倚著教官狐假虎威，而教官的個性則是老粗，所以大家都沒有多說什麼。後來訓導主任大喊：「教官有人丟石頭！」大家隨即鳥獸散。第二天訓導主任滿頭包的出現。這

件事情不得了，於是學校便開始追查與究責，查到底是誰丟石頭的，但是在晚上誰也看不見，當時訓導主任甚至恐嚇大家若不承認，就全校退學！寧可沒有學生也要退學。我當時原本想寧願犧牲我一個，因為好像我也有丟到他，心理滿懷愧疚，當下真的想衝上前去自白承認。但馬上被我一個同學拉住，說我傻瓜，出去就要開除了，真的出去就要開除了。最後的結果就是每班的同學記大過處分，記了也不用退學了。

高二時發生二二八，地方上有個青年團，青年團團長姓許，²¹ 後來他犧牲了，社會上有馬有岳、林茂盛等名人。因為西部鬧得很兇，馬有越出面跟軍隊交涉，說：「你們只要繳械，我們替你們保管，保證不會出事。」²² 大概得到妥協，所以並無大的暴動發生。我們學生也是被組織起來去守糧倉，現在吉安國泰醫院旁邊有個糧食局的糧倉，因為怕人家搶糧倉，所以學生們組織起來，我還當了小隊長拿了指揮刀，其他人則是拿三八式步槍，我們在那守了好幾天。防守的幾天時間，女中的學生就做飯糰，體

21 編按：此處所指的許姓團長為許錫謙。許錫謙（1915-1947），台灣花蓮人，家中為花蓮富商，戰前即在花蓮商界出名，戰後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其中馬有岳為幹事、許錫謙擔任宣社股長，並擔任《東台日報》編輯有《青年週刊》的編輯，在二二八事件中青年們組織「金獅隊」、「白虎隊」，最終聯合組成「青年大同盟」，許錫謙擔任總指揮。在二二八事件國府軍登陸基隆後，憲兵隊企圖捉捕許錫謙但未果，最終許錫謙在返回花蓮路上遭憲兵隊待補，於蘇花公路遭到槍決。參見：李筱峰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台北：玉山社，2015），頁 104-111。

22 馬有岳此時為省議員，擔任角色為花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席，縣府人員紛紛逃避下，市民要求軍警繳械但卻未成功，但因民眾組織良好，甚少發生和外省籍人士衝突的情形。參見：李筱峰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頁數 104-111。

恤我們，像是官桂英就做飯糰給我們吃。²³ 以下這段我覺得可能是密史：事情結束以後學校當然還是要追究，所以就來學校中查，當時我們的教官是個子矮矮的人，一點都沒有軍人的樣子，而且額頭很高、很大，我們都戲稱他是「兔子」，心裡是有點看不起他啊！但他是個有讀書的軍人，他雖然是教官，但平常都不穿軍服。二二八事件後，憲兵隊要來抓我們，因為我們也是參與者。教官出面說：「學校的事情我們自己會處理！」憲兵隊說上面的人要追查，他平常穿的是文官服，結果他一聽到馬上換成軍服，軍階掛著中校，來的是少校，結果他對憲兵隊說：「是你聽我還是我聽你？」結果就把對方趕走，這保護了我們沒有被抓去關的命運。青年團則是學校讓我們組成的，外面要來抓我們，學校還保護我們，當初我們要組織學生自衛隊時，是在青年團領導下所組織而成。但許錫謙後來被抓去了，但他要前往西部被審判的路上，在蘇花公路被槍決。馬有岳、林茂盛當時就選擇跑了，後來八月回來當了省諮議員。

讀花中時我也與我太太的哥哥性情合得來，認識了一位圖書館管理員，當時花蓮的圖書館是位於現今的南京街，很多日本時代留下的藏書，戰後來了一個管理員，他對日本時代遺留的藏書並不重視，我們認識管理員後，隨時可以去取書拿出來念，高中

23 官桂英女士對此表示並沒有此事情，雖然官桂英在二二八事件時有遭受關押，但其表示是遭受憲兵陷害所致，也沒有做飯糰給吳水雲的印象。而在〈花蓮縣警察局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處理情形表〉中計載，官桂英罪刑如下：「自治會主席召集開會主張排除外省人，煽動暴動。」。參見：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頁679。；〈官桂英女士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18年5月27日，於台北市文山區官宅，未刊稿。

時求知慾又十分旺盛，我幾乎世界名著大全，托爾斯泰等名人都有念過，一個星期一本就開始念，我想我的日文基礎大抵上是在此時所奠定，不只是日文基礎，也得了許多方面的常識。裡面我念了盧梭的《愛彌爾》，這本書使我非常感動，我認為教育應當如此，《愛彌爾》雖然只是教育的書，但卻是富含著自由的思想，認為天賦人權，後來天賦人權的概念引發了法國革命、美國獨立的運動，這本書對這些運動皆有影響，人生出來都是平等的，我想這與基督教教義也有所關聯，基督教教義認為人生而平等，一切權力皆為上帝所賜予，不分老幼、種族，這與 17 世紀以前的教育有著很大的不同，十七世紀以前的教育家長有著極度的威權，小孩子只要聽話即可，因此只要求服從，大人若問：「對不對？」，小孩只要回答：「對」、「好」，如此即可，完全的服從是當時教育的想法，他的目標只是要培養大人希望、喜歡的，所謂的「公民」，聽話的、服從法規的就好，根本沒有天賦人權的概念，念了《愛彌爾》以後我認為將來念大學就要走這方面，這時我就下了一生從事教育的決心。

當年農家出生的子弟，一般的第一志願還是希望念醫學院，畢業之後收入穩定可以當醫生。我的大哥也難免抱持著這樣的想法，也是希望我能升學的話就報考醫學院。但醫學院對我而言並無太大興趣，加上我從職業學校升學，職業學校重視技術方面的教育，所以理、數、英文方面較弱，所以我想我不可能走這條路。我哥哥問我想考哪裡，我回答他說：「師範學院。」²⁴ 他認為

24 台灣省立師範學院，1946年4月由行政長官公署核准設立，校舍最初利用台灣省立台北高級中學之校舍（原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為今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參見：陳慧珠，〈戰後台灣中等師資之搖籃——台灣

師院有什麼用，出來了不起當校長，若想當校長現在去當老師四年以後也能當校長，這番話我對我而言產生很大衝擊，致使我那段時間非常的洩氣。一方面希望高中畢業後能持續地升學，可是升學我哥哥要我報考醫學院，醫學院並非我所想的，不能考師範學院讓我很洩氣。倒是我的二哥提醒我，因為大哥不給我旅費，所以我沒有辦法到台北，那時是沒有聯考的，台北我不能去我就要放棄了，二哥跟我：「說你到台北去考哪個學校大哥怎麼會知道呢？」我當時才想到，所以說好聽是單純，但是說難聽就是笨，這種謊言我都沒有想到，所以我就跟大哥說好，你要我考醫學院我就報考醫學院，大哥認為這還差不多。

我報考了台大醫學院，考試時間為第一天、第二天，師院則是第二天、第三天，所以必須從中選擇一間學校，若兩天考台大，師院則必須放棄。台大第一天考了數學、英文，我也想試試看，假使算數我就放棄，英文我也沒有太多練習，高中時我也喜歡運動而課業並未太多關注，考試的結果是每一科低空飛過，文史方面我比較有把握。英文的部分我是背幾篇作文，作文分數佔了百分之二十五，我背了〈我的家庭〉、〈我的將來〉、〈我的希望〉，大概這三篇，我就賭了，數學我則是放棄，史、地與國文我比較有把握。考試的前一個月有個全省的排球比賽，我也代表了花蓮參加排球比賽。結束後有一個月的時間剛好暑假，隔壁的學長是醫學院的，他的宿舍就借給我住，那一個月時間是我真正唸到書的時間。以前都是馬馬虎虎的低空飛過，那一個月英文背

這三篇作文，文史重新看過，念到什麼程度呢？當時我們穿的是卡其褲，第一天根本沒時間睡，肚子餓了只吃一點東西，想睡就睡一下，一起來又繼續念書，第二天起來滿身都是紅點，蚊子咬我都不曉得，當時專心程度可見一斑。考試時，國文作文是：〈你看過有關教育的書，並加以評述之〉，我看過了愛彌爾，於是從作者背景、時代背景、寫到書的內容，我寫的淋漓盡致，我記得一大張還不夠，這應該幫我的考試拿到不少分數。英文題目〈Tomorrow〉，我則寫了我的希望，大概是有 match(對應)到，所以僥倖的考上了，考完後我就回到吉安，去幫忙農作。

考完後，有天同學們跑來跟我說：「老吳恭喜啊！」我說：「什麼事？」他們便說：「考取啦！」當時沒有報紙、沒有電視，所以我也不清楚狀況，他們在街上的人就知道了，所以晚上大家就開慶祝會，我想的是即使我考取了，大哥也不一定會讓我去念。心理真是納悶，於是去找媽媽商量，媽媽說：「你大哥三天前就知道，他的辦公室有報紙啊！三天前就知道，但他不作聲。」我想大哥心理一定很不高興，這傢伙說要去考台大醫學院，結果跑去考師院，後來我媽媽說你跟叔叔、伯伯去說，叔叔、伯伯看看能否跟大哥說說看，因為考上結果大哥不讓我去念，於是我就一個一個去說，我大伯以及其他叔叔伯伯就去責怪大哥，跟大哥說：「你弟弟考取了為什麼你不讓他念呢？」大哥說：「不是我不讓他念，我也是公務人員，從日本時代當到縣政府會計主任、商校主任、師院會計主任等等，一輩子公務人員，現在沒什麼前途。當醫生好，可以照顧自己與親屬朋友。」他講的其實也沒有錯，我假如是考醫學院，當時醫學院是七年，大學是四年，我還要多負擔三年，叔叔、伯伯這樣說也不是沒有道

理。最後大哥表示老人家（爸爸）還在，於是開了家族會議，家族會議中我說我的理由、他說他的理由，後來大哥表示由父親裁斷，這時我很慌張，平常我與母親關係較為密切，我爸爸是很樂天的人，平常什麼事情都不管，就是愛打牌、十分樂天的人，我與他都沒有談過，現在爸爸來決定我心裡覺得真是糟糕，沒有時間與他溝通過，真的是一句話決定了我的一生啊！那幾分鐘心跳真的非常快，最後他一句話：「別人考都不一定考的上，水雲考了就讓他念吧！」這句話真的決定我的一生。